

徐之先 主编



中日關係五十年

吳學文題

時事出版社

中日关系三十年

(1972—2002)

徐之先 主编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关系三十年/徐之先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02
ISBN 7-80009-736-6

I. 中… II. 徐… III. 中日关系-国际关系史-1972~
2002 IV. D822.3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0349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 行 热 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 子 邮 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5 字数: 423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本书简介〕

《中日关系三十年》系统阐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两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关系；总结了30年来发展两国关系的经验和教训；展望了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前景。

本书首次采用了有关中日复交、缔约谈判的最新资料；系统分析了冷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特点；详细总结了当前中日关系发展不顺的原因。本书还整理了1972——2002年中日关系大事记以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把握变化，重视未来

——中日建交三十周年回顾与前瞻

(代 序)

陆忠伟

中国与日本历史上既有过浪漫，也有过干戈。从中我们可以得到的惟一教训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回顾和总结历史，目的是着眼未来。

三十年起伏变化

今年是中日建交 30 周年，明年是《中日和平条约》缔结 25 周年。这都是中日关系史上值得纪念的非常重要的日子。总结 30 年来两国关系的转承启合，结合这

• 1 •

种关系的发展特点，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 1972 年建交到 80 年代初，是双方的蜜月期。奠定这种密切关系基础的因素很多，但国内外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三根支柱：一是战略合作支柱。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苏联的霸权主义随其 1979 入侵阿富汗更发展到了恶性膨胀的程度，进而成为当时国际和平的最大威胁。作为同与苏联存在领土问题的中国与日本，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便成为双方的最大利益，因而很自然地成为双方合作的战略基础，抑或说是一个大的安全器。当时，不仅限于中日关系，对于中美关系、中美日关系来说，共同防苏和联手反苏都是促进相互合作的一个重要战略条件。二是历史问题产生的积极作用。当时日本政界大多数人对那场日本侵华战争抱有很强的负罪感，因此决心通过建交为推动中日关系作出贡献。这种心态对日本各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大批政界、财界、经济界的有识之士都在积极从事推动中日关系的工作。当时有一种说法称，中日关系实际上就是日日关系，即日本国内的党派政治关系。围绕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当时日本政界内部确实出现了两派势力的分野，但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持积极态度的力量，无论是日本政界，还是学界、财界，都绝对是居于主流。由此也可看出，在相关历史问题上抱持何种态度对于中日关系具有何等重要的影响。

三是贸易支柱。日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开拓海外市场尤其是中国这一待开发的市场，对于其经济发展自然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当时更是百废待兴，集中于经济建设，并将学习的对象首先集中在了中国的近邻日本身上，同时积极争取来自日本的官方援助、直接投资、技术转让等。正是这种相互的需求，双方的经贸合作从民间往来开始，建交以后转为官方合作，贸易额从1972年起迅猛增长。总之，上述三个支柱基本撑起了这段时期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根基。

第二个阶段是冷战结束至90年代初，双方关系进入不稳定期。这种不稳定，主要源于支撑第一阶段中日关系的内在动因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因素在中日关系中消失，中国作为防止苏联南下的万里长城的战略价值，在日本决策者那里明显变质。正如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一样，中日关系也处于一种调整状态，缺乏新的战略基础的中日关系亦随之进入不稳定期。其次，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国内政界发

生了很大变化，新老交替步伐加快，一大批新生代政治家陆续步上政坛。这批人虽孕育产生于既有的政治土壤和政治文化中，带有日本旧体制的烙印，但由于成长的国际、国内环境与老一代政治家不同，加之持有较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完全没有为了国家而怎么样的想法，更没有为别的国家做些什么的感情基础。对侵华战争基本上没有日本老一代政治家那种负罪感。这导致日本国内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力量遭到削弱，围绕中日历史问题出现了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等一系列有负面影响的事情。第三，在经贸方面，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在中国实力增强和日本经济萧条的背景下，双方时有摩擦。这些因素造成了中日关系在冷战之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停滞，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中日关系的更新期。这个阶段与第二阶段没有明显的划分，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的延续，因为冷战后的负面影响这时仍然存在，仍主导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但是，同第二个阶段相比也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中日双方开始致力于推进新形势下的双边关系发展，寻求一些新的发展动力。为解决相互信任问题，中日双方积极开展各个领域的实质性接触，建立磋

商机制，其中：中日外交磋商机制已经建立，经济领域的磋商机制也呼之欲出，在安全领域也有一定级别的官员会晤。除第一轨道外，第二轨道的接触也在加大、深化。2002年中日学者间正式启动了一个重要交流轨道，即研究探讨中日关系与台湾问题，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学者交流虽然作为第二轨道，但很多成员来自官方，这有助于缩小双方的歧异，促进相互间的信任。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中日的合作领域和范围在扩大。首先表现在双方积极寻求安全领域的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2000年10月份朱镕基总理在访问日本时，提出实现双方军舰互访，推动双方在安全领域的对话。后虽因历史问题的干扰（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未能实现，但双方致力于安全领域直接交流的热情始终未减。其次，表现在双方加强在地区事务中的合作上，如积极推动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建立在10+3框架下的合作等。

正视现实

从发展的眼光分析，“远即美、近即丑”这句中国

的古话可以反映中日关系变化的一大特点。当双方蒙着面纱，或正面接触较少的时候，都对对方有一个美好的憧憬和印象。但是经过大量接触和直接的交往之后，双方发现对方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如中国文化、文明与自然魅力在日本人眼中逐渐减少，而中国人对日本的经济神话、安全神话、抗震神话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此外，与“远即美、近即丑”相对应的是亲兄弟、明算账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现在日本人开始对中国算人情账、经济账、贸易账等等，算得比较多的是援助账，意思就是提供了这么多的经济开发援助，帮助中国沿海地区建立起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中国应该表示感谢。

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对称性，或者可以说是某种程度上的经高政低，是中日关系的又一大特点。目前双方的贸易额接近 900 亿美元，经贸合作规模相当大，是全方位的发展。在政治领域，双方互为最重要的邻国，最高领导人的互访非常频繁，外交层面、经济层面的交往也很频繁，两国之间的游客来往数量相当多。但相对于双方的贸易规模和经济关系而言，政治关系还未达到一定的高度，问题仍然很多。这里关键是存在一

个信任问题，而信任的背后还是历史的阴影。实际上，中日政治关系一直受到历史阴影的影响。

两国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的不同，加上世界观、安全观、人权观、主权观方面的分歧，以及日本国内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的渲染和炒作，如提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等等，导致双方之间不断的猜疑。我们看到，即使在中日建交 30 周年之际，一方面是两国都安排了大量庆祝活动，包括民间团体、学术界、文艺团体、教育团体、友好城市之间的庆祝活动，搞得热火朝天；但另一方面是日本的舆论在所谓的中国的冷冻菠菜残留农药问题、减肥药致人死地问题、沈阳总领馆闯馆事件等问题上炒作得近乎反常。

分析中日关系目前的基本特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两国各自的发展状况对这种关系的影响。从日本方面看，日本国家发展十年的颠簸对中日关系确有较多不利影响。

从 1993 年迄今的整整十年，可以说日本是漂流、动荡、颠簸、改革、迷茫的十年。它既是日本社会大变革、调整国家航向的十年，也是日本为适应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变动而苦斗的十年。在这十年内，日本基本上

是政权寿命短、停滞时间长、有得有失、有破有立。这是百年不遇的大变革。

15年前，当日本处在泡沫经济巅峰的时候，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拿出了他的成名之作《大国兴衰》，该书预测日本将在21世纪争夺霸权，并提出了如下五点依据：（1）政府的指导性产业政策；（2）雄厚的研究开发实力；（3）居高不下的储蓄率；（4）政府实行的有效规则；（5）高质量的劳动力。然而人们在今天重温书中观点时发现，除了高储蓄率还令日本人自豪外，其他的光环已经黯然失色。

经济上经历了失去的十年：随着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处在一个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过程，这种调整并不顺畅，导致经济十年来一蹶不振；银行坏账居高不下，私人消费低迷不起，设备投资连续徘徊。但同时也应看到，日本今天的制造工业的实力仍不可小视。一位颇有影响的日本专栏作家寺岛实郎曾撰文写道，在被认为失去的十年中，日本的贸易收支盈余累计高达12500亿美元，世界经济村的出口专业户仍非日本莫属。

政治上是融解的十年：政治家新老交替，执政党离

散聚合；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保质期已过，其支持基础（农民、中小企业职员等）日益缩小。一位比日本人还熟悉日本政治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 G·科蒂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的自民党正走着与原社会党走向自我毁灭非常相似的路子；因为自民党正从包容一切的政党变成代表面日益狭窄的政党。

尽管政治中枢的永田町涛声依旧，但该党新生代议员为主的第二梯队，以及蠢蠢欲动的新右翼已经准备登船抢舵。时至今日，需要解答的是，面对已失去十年的日本，今后会否出现失去二十年。

思潮上是保守化的十年：在 1999 年春夏的国会中，接二连三地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国旗国歌法》、《通讯监听法》、《宪法调查会设置法》，面对长期的动荡，日本国民好比处在一个看不见出口的废坑道之中，充满焦虑、不满、急躁；挫折感、沮丧感好像积聚在地表之下、快速流动的岩浆，一旦找到出口，即会喷薄而出。受这种强烈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标榜改变自民党、改变日本的小泉纯一郎与标榜改变东京都，改变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分别成了偶像人物，得到了国民的压倒性支持。在政坛上，极右势力正逐步向执

政权力中枢靠拢，有识之士担心法国的勒庞现象可能在日本重演。

行政上是权限大移动的十年：战后，在自民党长期执政形成的权力结构中，内阁会议决定的事项事先需要在事务次官会议上得到全体一致承认才能提交，真正的行政权是由官僚机构掌握的。官僚机构与自民党的政务调查会的各种小委员会结成轴心，把持着决策大权。近两年来，日本积极推进行政改革、政治改革与公务员制度改革，由此将行政权力从官僚向政治家移交；从中央向地方分散，以中央省厅各部门的精简重组为契机，日本的内阁机能得到大幅度强化。即把战后长期形成的国家上层权力的平台型构造改变为首相为顶点的金字塔型，以内阁府为标志，建立了日本国家经略的司令塔，首相官邸有逐步发展为白宫的势头。

安全上是跃进的十年：作为一个活跃的战略角色，日本即将迈入普通国家的门槛。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借船出海，利用国际环境变化的风向，及美国亚太安全战略中促日本进一步发挥安全作用的推力，实现了安全战略的三级跳。1999年夏，日本通过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日本自卫队得以以此为跳

板，以配合美军作战为由，将军力投放到太平洋地区。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使日本抓住机会，于同年10月迅速通过《反恐怖特别措施三法》，从而使自卫队舰只游弋于印度洋，完成了海湾战争以来历届内阁的安全战略目标。2002年4月，日本国会开始讨论《紧急事态法》等战争法案。这一法案规定首相拥有在紧急事态下，不经过作为军事危机管理机制职能的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直接下令调动军队的权力。以战时立法形式突破宪法和国会限制的意图十分明显。有观点把日美安全关系视为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瓶盖，但实际上，日本的和平宪法才是更安全的瓶盖。

目前，小泉内阁在推进改革方面，遇到几股强大的阻力：首先是国会中代表既得利益的道路帮、农林帮与邮政帮。这些帮议员多来自自民党的大派，他们与特定官厅保持密切的关系，并在这些官厅的权限管辖领域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扮演着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人的角色。为防止因改革触及既得利益而导致票田水土流失，他们正拉帮结伙与小泉讨价还价、抬高筹码，小泉进退维谷。如围绕本届延期国会最大焦点的《邮政相关法案》，两股势力争斗长达两个多月，小泉曾扬言，在此问题上

不是自民党摧毁小泉内阁，就是小泉内阁击溃自民党，但从目前看小泉已从强硬立场后退，有向邮政帮妥协的迹象。这种要面子、不要里子的作法，势必将严重影响小泉政权的改革形象。其次，小泉的政治信任度下降。一年多来，日本政坛丑闻不断：加藤紘一、铃木宗男、井上裕等自民党大佬均因金钱而落马，舆论严厉追究政客的道德、政官粘连关系及小泉的用人责任。再次，处于决策中枢的要人不断出现乱放炮现象。从以上情况看，有媒体认为，小泉政权已出现森喜朗政权的末期征候。美欧媒体为此毫不客气地说，小泉是未能实现改革目标的日本的戈尔巴乔夫。

一年多之前，当小泉走上政治T型舞台时，与任何政权同样，是以强调与前政权的不同政策色彩来作秀的。但小泉没有意识到，他与1993年以来的几届内阁走的是同一条政治不归路。如小泉推行的邮政储蓄民营化与桥本龙太郎的金融大爆炸一脉相承；小泉对特殊法人的“关停并转”是桥本、森喜朗内阁中央省厅改革的延伸；森喜朗政权推出的IT战略则是小泉内阁重振经济战略的支柱。小泉可能会以痛苦先生在历史上留名。正如一些学者所预言，对小泉的评估可以高，但对小泉

的期待不可过高。

上述经济、政治、思潮、军事及行政上的大变化等综合因素决定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不稳定性。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诸如沈阳闹馆事件等往往成为日本朝野宣泄心中郁闷的一种出口；日本政界能够在中日关系上负责任说话的人越来越少，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对国家利益不负责任的政客则大有市场。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对中日关系更多应是积极影响：

第一，中日综合国力接近利于形成均衡，可稳定中日关系。从历史上看，中日综合国力变化有三个大的阶段。从隋朝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基本上是中强日弱，隋朝时期日本派遣大量使者到中国学习文化和科学技术，唐朝时期又有大量的遣唐使，这些都表明了当时中国国力的强盛。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基本上是日强中弱，这个态势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的 80 年代。多数学者、专家认为，此后至今，甚至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可能是一个中日在综合国力上强强并存时期。单从经济上讲，中国经济要赶超日本还需有数十年的时间，但综合国力上中国和日本